



云南民族史研究

周廷贤著

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云南民族史研究

周廷贤著

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(滇)新登字02号

责任编辑：黎穆

封面设计：张炫

封面题字：赵浩如

云南民族史研究

周廷贤 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昆明市大观路39号)

昆明铁路分局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.25 字数：13万字

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000

书号：ISBN7—5367—0448—8 定价：3.60元
K·94

导　　言

云南是人类发祥地之一，是我国远古人类的故乡，从古猿——猿人——古人——新人四个发展阶段，都发掘出有关化石。是研究人类起源和猿人进化的最好素材。云南又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边疆省份，而云南各族的历史发展从来都是不平衡的。早在公元前十三世纪，剑川一带的居民已跨上了文明时代的门限，西汉初滇池区就出现了发达的奴隶制，而其他大部分地区，仍处于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。有的尚处于“犹知识母，不复别父”的母系民族社会。有的甚至还保留“贤老相食”的蒙昧时期的习俗。到了东汉末年随着云南“大姓”的兴起，出现了领主制的萌芽。宋代，领主经济在滇池、洱海区已占统治地位。元初，云南首创行省制，实行封建中央的统一政策，促进了地主经济的发展。明末清初，随着“改土归流”的实施，云南地主经济迅速发展。这时，在云南矿冶业中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。但云南边沿区和山区的部分少数民族，直至解放前夕，仍然存在着奴隶占有制、领主制的经济形态，有的甚至还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发展阶段。从这点讲，可以说，云南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。可见云南民族史有不少很值得研究的问题。多年来很多学者专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。但由于史料缺略，至今仍有不少重大的历史问题尚无统一认识或未作出科学结论。同时，从整个云南历史发展过程看，存在着许多不同祖国内地的特点，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。因此，研究云

南各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，以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方面的发展及特点，认识云南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，仍然是史学界一项艰巨的任务。

《云南民族史研究》主要是探讨云南各民族在先秦、秦、汉、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宋和元、明、清几个史历阶段中的一些重大问题，以及尚无统一认识的问题。并对这些问题，提出看法，加以论证。对先秦时期云南各族群的族属渊源，云南民族社会的发展状况及特点；对秦汉王朝经营云南的政策措施，云南“屯田制”、“羁縻制”的起源及学校教育的产生、发展和特点，秦汉时云南的境内外交通及族属演变情况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，对诸葛亮的“和抚”政策，云南“大姓”的兴起，领主制的产生以及爨氏割据下的云南；隋、唐、宋时期，对南诏奴隶制的特点，南诏政治、军事制度；以及元、明、清时代，云南纳入封建中央的直接统治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方面政策制度的改变和变化亦对云南社会发展的贡献，提出看法，进行论述。以上问题，我虽然进行了多年的研究，但由于能力和水平所限，误差难免，请予指正。

周廷贤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导言 | (1) |
| 云南多民族的由来和发展 | (1) |
| 云南的原始氏族社会 | (13) |
| 秦汉时期云南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 | (26) |
| 秦汉时期“西南夷”的族系及分布 | (60) |
| 云南“屯田制”的起源及其影响 | (70) |
| 我国最早的对外交通线“蜀身毒道”的开辟与云南 经济文化的繁荣 | (80) |
| “僰道”“南夷道”“西夷道”的修筑及对西南边 疆经济文化的影响 | (86) |
| 云南古代文化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| (94) |
| 诸葛亮的“和抚”政策与云南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| (105) |
| 云南“大姓”的兴起及爨氏割据下的云南 | (113) |
| 南诏奴隶制的发展及其特点 | (126) |
| 南诏的政治、军事制度试析 | (135) |
| 赛典赤的改革与元代云南社会的发展 | (146) |

云南多民族的由来和发展

云南是我国民族成份最多的一个边疆省份，在全国五十多种少数民族中，就有二十多种民族的全部或一部份分布于云南。云南形成多民族的原因很多，其主要原因，渊源于古代。远在氏族社会时期，云南就是一个多族群的杂居区。从新石器文化看，云南共发现较大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数十处，主要分布在滇中、滇东北和滇西北，分布虽不均匀，但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有人类居住。从出土的文化遗物看，滇池区的居民都居住在陆地，村落多分布在小山上或半山腰，洱海区的居民都是傍水而居，多为半穴居。而元谋的居民是在陆地建造土木结构的房屋居住。剑川的居民则住着“干栏”式房屋。可见云南新石器文化的种类很多。说明氏族社会时期云南居民的成份复杂，这里居住着文化系统不同的各族先民，他们在不同的住区里，创造着自己的民族文化。从先秦文献记载分析，氏族社会时期，我国境内分布着文化系统不同的各族先民，其大致分布为南蠻、北狄、东夷、西戎①。这时，我国西南地区就有“氐羌”、“百越”、“百濮”三大族群活动的记述。“氐羌”族群中的“叟”人、“昆明”人和“僰”人，大约在商周时期，就活动于川西南和滇东北，成为云南最早的外来居民。武王伐纣时，就有西南地区的“羌”人参加②。氏族社会时期，云南还居住着许多“濮”人部落集团，他们多是云南的土著居民，也可能有一小部分是由外地迁来。王忠在《周秦少数民族研究》中说：

“濮于西周之初在巴中，东入荆，居江汉间。由楚之西南下入江，东至岳州，南入湘源，又至于永昌（今云南保山）”③。商朝时，云南的“濮”人曾向商朝献犀、象、翠羽、短狗等物。武王伐纣时，就有云南的“濮”人参加，周朝初年，又向周朝贡丹沙④。春秋战国时，云南南部还有不少“濮”人居住⑤。可见，氏族社会时期，云南居住着许多“濮”人。秦汉以前，云南西南地区，还有“百越”部落的人口散居⑥。他们来自我国东南沿海的古“越”人。在云南新石器文化中，出土了不少有肩石斧，为东南沿海新石器文化中常见之物，或可说明氏族社会时期，东南沿海的古“越”人已有一部分徙居云南。总之，早在氏族社会时期，云南就是一个多族群的杂居区。这时，云南的居民可能是“濮”人最多，大约已遍布云南大部地区。“氐羌”部落集团进入云南的也应不少。同时，也有不少“百越”部落的人口散居云南西南一带。云南各地居民的社会发展状况，从来都是不平衡的，剑川一带的居民大约公元前十三世纪已跨上了文明时代的门槛，西汉初，滇池区已出现了发达的奴隶制，但其它大部地区的原始氏族社会却延续下来，个别地区的少数民族直到解放前，还没有完全进入阶级社会。所以，上述云南氏族社会时期，主要是指秦汉以前，滇池、洱海区尚处于氏族社会而言。

秦汉时期，云南三大族群的分化融合情况。

这时，云南的居民统称“西南夷”，“西南夷”的分布区，包括云南、贵州及川西南一带，大约居住于滇池区和滇东北地区的称滇、劳侵、靡莫、僰等；滇西地区的称嶲、昆明、叶榆、桐师、巂唐、哀牢等；滇东南和黔西地区的称夜

郎、句町、漏卧、且兰等；滇北川西南地区的称邛都、徙、笮都、摩沙夷等；川西北和甘肃南部的称冉駹、白马等等^⑦。以上称谓有族称，也有以部落名和地名代族称的。他们都是由先秦时期的“氐羌”、“百越”、“百濮”三大族群分化融合而来的。属于“氐羌”系统的族群和部落有滇、僰、劳侵、靡莫、邛都、巂、昆明、哀牢、徙、笮都、摩沙夷等。他们都来源于先秦时期进入云南的“叟”人“昆明”人和“僰”人。属于“百越”系统的族群称为越、僚、鳩僚、濮等。部落名称有夜郎、句町、漏卧、滇越、且兰、头兰、进桑等^⑧。他们已分布于云南和黔西的大部地区。其中分布在牂牁郡的称僚、濮；分布在兴古郡的称鳩僚、濮；分布在永昌郡的称“滇越”，东汉时又称“滇越”为鳩僚或越。属于“百濮”系统的族群称苞满、闽濮^⑨。秦汉前，我国称“濮”者甚多，而秦汉时称“濮”者甚少。同时，有不少“越”人亦称为“濮”。可能这时有相当数量的“濮”人，由于长期与“百越”系统的族群交错杂居而溶入“越”人之中。汉代他们已共有穿鼻、儋耳和纹身之俗。
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云南“大姓”兴起，逐步形成爨氏“大姓”割据云南的局面，爨氏统治的基本地区，分为东西二境^⑩。西境称“西爨白蛮区”其区域东自曲靖，西至洱海以东，南达红河。东境称“东爨乌蛮区”，指令曲靖、昭通一带，以及贵州西部，南达滇越边境。秦汉时居住在云南的“僰人”、“昆明”人和“叟”人与其交错杂居的汉族人口，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，由于云南长期闭关自守，比中原战乱局面，社会环境相对安定，居住在同一区域内的各族群经过频繁的迁徙对流，分化融合，经济文化特点逐步趋于一

致，他们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，迈出了关键的一步，进行了重新组合，形成了新的共同体“白蛮”和“乌蛮”。这时居住在“西爨区”的“僰”人，与其相杂居的大量汉族人口，以及部分“叟”人和“昆明”人，逐步溶合为“白蛮”共同体。居住在“东爨区”的“昆明”人和“叟”人，和部分外来人口逐步溶合为“乌蛮”共同体。他们散居在云南的广大地区，各部落发展极不平衡。到南北朝时期，他们已分化出“和蛮”、“施蛮”、“顺蛮”和“磨些”等等。

云南境内爨氏统治区以外的各族群，社会发展比较落后，多处于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，这些地区的居民，多是云南的土著居民——“濮”人，由于受到经济文化比较先进的“氐羌”族群的排挤，逐步迁徙到边沿区，与后进入云南的“越”人相杂居，南北朝时，多数已溶入“越”人之中，称“僚子”。有的仍保留“濮”人的特点，称“缅戎”。这种“缅戎”可能是唐代的“朴子蛮”，“望蛮”和“外喻”等族群^⑪。原“百越”系统的族群，秦汉时的“越”、“僚”、“鳩僚”、“滇越”，两晋南北朝时，多称“僚子”。有的不见于记录^⑫。

随、唐、宋时期，云南各族群，经过南北朝时的大分化、大溶合，逐步完成了民族形成的过程。这时，“氐羌”系统各族群，逐步形成汉藏语系，藏缅语族中的各族。其中，“白蛮”包括不少的汉人成分逐步形成了“白人”，亦称“僰人”（白族）。本来，“白人”是藏缅语族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，但因唐代“乌蛮”蒙氏建立南诏奴隶制政权，他们为了巩固其统治，进行了强制性大迁徙，把大批“白人”从原地迁走，有相当一批“白人”被没为奴。

“白人”“大姓”在政治、经济上被打击削弱。故整个唐代，“白人”人口没有得到大的发展。唐代末期，洱海区又有部分汉族人口和“乌蛮”被溶入“白人”之中。南北朝时期的“乌蛮”，到了唐、宋时期，逐步形成了汉藏语系，藏缅语族中，白族以外的各族。其中，洱海至永昌一带的罗罗，宣威、昭通、西昌、凉山、黔西的勿邓、两林、半巴、阿芋路、卢鹿蛮，楚雄东部、滇中、曲靖、红河、文山一带“乌蛮”中的大部分形成彝族。“施蛮”“顺蛮”逐步形成傈僳族。“施”、“顺”即“叟”、“嵩”的近音，故“施蛮”“顺蛮”来源于唐以前的“叟”、“嵩”族群。“锅铿蛮”：唐、宋以后逐步形成了拉祜族。“磨些蛮”：逐步形成了纳西族。“寻传蛮”：唐、宋时期形成峨昌，即阿昌族。其中一部分形成景颇族的载瓦支。“裸形蛮”或称“野蛮”，唐、宋时逐步形成景颇族。“和蛮”亦称“和尼”，唐、宋时逐步形成哈尼族。

居住在云南的“百越”系统各族群，南北朝时期称“越”、“僚”、“鵩僚”、“僚子”，唐、宋时逐步溶合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族。原永昌（今保山一带）的鸠僚形成了“金齿”、“银齿”、“黑齿”、“绣脚”、“绣面”、“茫蛮”^⑬。兴亡郡的鸠僚形成了“白衣”、“棠麌”。今西双版纳的“僚人”逐步形成了“茫蛮”、“黑齿”、“漆齿”。今思茅、临沧的“僚人”形成“金齿”、“银齿”、“黑齿”、“绣脚”、“绣面”。看来“金齿”、“银齿”、“黑齿”、“漆齿”、“绣脚”、“绣面”、“茫蛮”、“白衣”都是傣族的他称。其自称当为“傣”。因傣族传说他们最早的建寨人是“傣勐”，唐、宋时傣族有自称“棠麌”。

者，“棠魔”即“傣勐”近音，故傣族自称应是“傣”。唐、宋时，“百越”族群中已明显分化为两大部分。一部分自称“傣勐”或“棠魔”。另一部份仍保留古老的族称“僚”。其中分布在今文山、红河一带的又称“依”或“洞僚”。散居在今昭通一带的称“葛僚”^⑭。“洞僚”、“葛僚”后来形成壮族。唐、宋以前“百濮”系统各族群被“氐羌”族群排挤，大部分迁至云南边沿区，留下的部分多与“氐羌”和其它族群相融合。迁至云南边沿区的与“越人”相杂居，其中大部分已溶于“越人”之中，剩下的称“缅戎”，唐、宋时期称“望蛮”“外喻”和“朴子蛮”^⑮。“朴子蛮”后来形成布朗族和德昂族（崩龙族）。而永昌境内的“望蛮外喻”部落和今澜沧、孟连一带的“望蛮”后来形成佤族。一般认为佤族、布朗族和德昂族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。唐代，今文山一带有少数苗众居住^⑯。他们从湘、黔、川、鄂连接地带迁入云南。

元、明、清时期：云南境内分别居住着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白族：其称谓有白人、僰人、僰子、白子、民家、民家子、那马、勒墨等^⑰。彝族：称谓繁多，且不同时期变化较大。元代彝族称罗罗、黑爨、乌蛮。明代彝族称罗罗，又分白罗罗、黑罗罗两种，这两种中各个部份又称鲁屋、妙罗罗、阿者、罗婺（罗午、劳羽、罗胡）、木察（摩察）、撒摩都、惲鸡、仆刺、阿成、车苏、普特、撒弥、撒完（些袁）、喇鲁、乾罗罗等。清代，彝族除明代称谓外，又产生了很多新的称谓，可能是清代才新发现一些族群，如：子间（子君）、聂素、漫且、孟乌、葛裸、阿度、阿戛、阿苏、喇鲁、利米、披沙夷、海罗罗、乾罗罗（又称黑乾夷）、甘人或

乾人等^⑯。纳西族：元代称末些，明、清都称么些^⑰。末些与么些应是同音异写，民间还有一些称呼，不见记录。哈尼族：元代记录中称“斡尼”、“禾尼”。明代称“窝尼”、“和尼”或“倭尼”。清代又增加了些新的称谓。如：“卡堕”、“黑铺”、“糯比”、“喇乌”、“罗缅”等^㉑。傈僳族：元代称“户蛮”。明代称“栗些”或“力些”。些与傈同声，故栗些亦是傈傈的异写。清代称傈僳^㉒。阿昌族：元代称峨昌。元明时期还包括景颇族的载瓦支，清朝记录才区别开来，称阿昌族^㉓。怒族：元代以后才见记录，称“怒人”^㉔。拉祜族：由唐、宋时“锅铿蛮”分化形成，清以前未被识别，清代记录称“裸黑”^㉕。独龙族：元以前不见记录，元代记录称“撻”，明、清时称“俅”^㉖。近代居住于独龙河一带称独龙族。景颇族：元、明时称谓与唐、宋时同称“野蛮”，亦称“野人”。清代称遮些、结些、野人^㉗。自称景颇、载瓦、喇期、浪峨，但不见记录。藏族：可能唐代由吐蕃迁来，元代始见记录称“吐蕃”。明、清称“古宗”^㉘。普米族：元初随蒙古军进入云南，称“西蕃”。清代又称“巴苴”^㉙。基诺族：称基诺、攸乐人，可能因居住攸乐山得名。还有唐、宋时的“锅铿蛮”，后来分离一部分逐步形成苦聪人。

元、明、清时，云南还居住着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傣族：元代称谓与唐代大致相同。记录中则多称为“金齿百夷”，或称“金齿”与“百夷”。明代称“百夷”，因分部区不同而有“大百夷”、“小百夷”之称。清代记录称“摆夷”^㉚。又称明代的“大百夷”为“旱摆夷”，指居住于今德宏州的傣族。居住于今西双版纳州的傣族明代称“小百

夷”，清代称“水摆夷”。居住在普洱府的称“花摆夷”，从缅甸迁入的称“戛子腊”，从老挝迁入的称“挝家”或“老挝”。以上皆他称，其自称唐以来一直称为“傣”。壮族：元、明、清时称侬人、沙人、土僚和仲家^⑩。云南还居住着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族：元代应与唐、宋时同称“望蛮”未见记录。明代称哈瓦、古刺、哈刺、哈杜。清代称“戛喇”和“卡瓦”^⑪。布朗族：元、明、清称“蒲蛮”或“蒲人”^⑫。德昂族：清代前尚未从“蒲人”中分离出来，故未见记录，清代始见于记录^⑬。云南还居住着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苗族和瑶族。唐代记录中已有“苗众”的记载，大约“苗众”里包括苗族和瑶族，他们同来源于先秦时期的“三苗”、“九黎”的“蛮人”部落集团，唐、宋时只有少数迁入云南。元代记录中又只有“徭”而未见“昔”。明代，“苗”、“瑶”皆未见记录。清代云南境内的苗族，主要散居于滇东北到滇东南一带，今楚雄、大理州的苗族未见记录。其称谓有“花苗”、“红苗”、“青苗”、“黑苗”等等。其中“花苗”最多^⑭。瑶族：“多处深山”，主要散居于广南、开化二府境内^⑮。此外，云南还居住着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族：元朝随蒙古军和蒙古统治者进入云南。明代蒙古族的大部份人口已融合于与其相杂居的各族之中。清初只有少数蒙古族聚居于河西县境内。云南还居住着操汉语的回族：他们随蒙古军进入云南。

云南形成多民族的另一个原因，是云南地处边远闭塞的西南边陲，又属高原，境内崇山峻岭，交通极不方便，给人们经济文化交流带来很多障碍，所以同一族群的人们，由于居住分布区不同，长期隔绝，逐步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经济文

化特点，从而形成不同的民族。如：“氐羌”系统各族群，在云南就分别形成了白族、彝族、纳西族、哈尼族、傈僳族、阿昌族、拉祜族、景颇族等等。同时，又由于外来的统治者进入云南统治的同时，带入了一些少数民族的人口。如：蒙古族、回族和普米族就是随蒙古军进入云南的。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人口，是由于避难或其它原因由附近地区迁入云南。如：苗族、瑶族和藏族。

注释：

- ① 《孔记·王制》云：“中国戎夷……东方曰：夷。……南方曰：蛮……西方曰：戎。……北方曰：狄。”
- ② 《尚书·周书·牧誓》云：“……及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人，称尔戈、比尔干、立尔矛、予其誓。”又孔颖达《尚书·正义》云：“此八国皆西南夷也。文王建国在西，故西南夷先属焉。”
- ③ 王忠在《周秦少数民族研究》中还说：“则濮以楚逼，后遂至建宁再至永昌”。
- ④ 《逸周书·王会解》说，商汤时曾令西南地区的濮人向商朝献犀、象、翠羽、短狗等物。《尚书·周书·牧誓》有西南地区的濮人参加武王伐纣的记载。《逸周书·王会解》说，西南地区的濮人曾向周朝贡丹沙。《春秋左传》亦有类似记载。

- ⑤ 杜预《左传释例》云：“建宁郡南有濮夷，无君长总统，各以邑落自聚，故称百濮”。
- ⑥ 据《史记·南越尉佗传》记载，汉初，原秦派去住守今两广和越北一带的将领赵佗曾在这一带建立南越国，其势力范围达贵州南部和云南西南地带，说明这一带秦以前就有不少越人居住。
- ⑦ 见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、《汉书·西南夷传》、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传》、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、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。
- ⑧ 据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、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、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传》记载分析，“夜郎”族群属“百越”系统。
- ⑨ 见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、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
- ⑩ 据《爨龙颜碑》说爨氏统治区分东西二境。西境是爨氏统治的中心区，大致是刘宋以后形成，本来是爨氏大姓和僰人的居住区，南北朝时，僰人与其长期交错杂居的汉族人溶为一体，故史称“西爨白蛮”。东境是爨氏统治的边沿区。散居着许多发展较落后的族群，随着爨氏统治区的扩大。东西境的范围也不断变化。
- ⑪ 见《爨龙颜碑》、《蛮书》卷四。
- ⑫ 见张九龄《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》
- ⑬ 见《蛮书》卷四、卷六
- ⑭ 见《新唐书·西原蛮传》，《新唐书·南平僚传》云：“戍、泸间有葛僚，居依山谷林箐，逾数百里，……。”
- ⑮ 见《蛮书》卷四
- ⑯ 见《蛮书》卷十
- ⑰ 见雍正《云南通志》卷二十四，文果《洱海丛谈》、康熙《楚雄府志》、《清职贡图》、《雍西闻见录》

- ⑯ 见道光《云南通志·人种志》、乾隆《东川府志》、康熙《罗平县志》
- ⑰ 见李京《云南志略》、《清职贡图》、《丽江府志》
- ⑱ 见道光《云南通志·人种志》
- ⑲ 见《元一统志》《云南图经志书》、《清职贡图》
- ⑳ 见《元史·地理志》、道光《云南通志·人种志》引《清职贡图》
- ㉑ 见道光《云南通志》
- ㉒ 见康熙《楚雄府志》
- ㉓ 《元一统志》丽江路风俗说，丽江路有“撒”与“卢蛮”、“土蕃”杂居。明代不见记录。《清职贡图》、《伯麟图说》皆有关于“僕”人的记述。
- ㉔ 见李京《云南志略》、道光《云南通志》引《伯麟图说》，康熙《永昌府志》卷二十四
- ㉕ 《元一统志》丽江路风俗说，丽江路有吐蕃，天启《滇志》卷三十及《维西闻见录》有关于明清“古宗”的记载
- ㉖ 见天启《滇志》、《维西闻见录》
- ㉗ 李京《云南志略》中称傣为“金齿百夷”，其它记录称“金齿”或“百夷”，明代称“百夷”，清代称“摆夷”。“百夷”“摆夷”皆同音异写。
- ㉘ 《元史·本纪》说：至元十二年今广南、富宁地区有农七万户、率农夫戍、农夫戍、农道、贤共州县三十七、户十万清降。可见这一带地方士著贵族皆姓农，其统治下的居民称“农人”。又李京《云南志略》有“土僚”的记载，《元史·忽辛传》有沙奴的记载。天启《滇志》有关于明代“农人”、“沙人”和“土僚”的记载。雍正《师宗州志》云：“种家，一作仲家，即沙人。”
- ㉙ 见天启《滇志》卷三十和雍正《云南通志》。